

# 朱维铮史学史论集

朱维铮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朱维铮史学史论集

朱维铮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朱维铮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309-11551-2

I. 朱… II. 朱… III. 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0094 号

朱维铮史学史论集

朱维铮 著

责任编辑/陈麦青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6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551-2/K · 539

定价: 3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整理说明

这部论文集共收录朱维铮先生已刊史学史论文十一篇。

其中,《史学史三题》、《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班固与〈汉书〉》、《班昭考》、《史官与官史》、《论“三通”》等八篇,朱先生生前已接受复旦大学出版社建议,拟结集刊行,后因病笃而未及实施。

在这八篇基础上,今增加《王沈〈魏书〉的考证》、《“乾嘉史学”:方法与争论》和《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等三篇论文。第一篇为遗稿,系朱先生辞世后,学生从手稿中发现,经整理后刊于《复旦学报》。

整理者核对了论文中的引文,改正了由排印造成的错字、讹文。其他各方面,如标点符号和书名号等,为保持原文原貌,一仍其旧,基本未作改动。

廖梅 姜鹏

二〇一五年四月

# 目 录

史学史三题 .....	1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	29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	
——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	60
司马迁 .....	80
班固与《汉书》	
——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	114
班昭考 .....	132
王沈《魏书》的考证 .....	169
史官与官史	
——韩、柳的史官辩 .....	178
论“三通” .....	207
“乾嘉史学”：方法与争论 .....	230
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	252

## 史学史三题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李大钊、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1〕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2〕,被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

---

〔1〕依时序,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谰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2〕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先生也是第一人。

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1〕

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2〕。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3〕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

〔1〕 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2〕 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炼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3〕 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也都以新貌再现〔1〕。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

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2〕。

《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

## 一 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

---

〔1〕 谭其骥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文革后谭其骥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2〕 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商讨后所订。



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

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sup>〔1〕</sup>。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祇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sup>〔2〕</sup>。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sup>〔3〕</sup>,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sup>〔4〕</sup>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

〔1〕 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借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

〔2〕 《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

〔3〕 《孟子·离娄下》的这则说法,在西汉经今文学诸传论及《史记》中均未见引用,至唐宋经学更新运动过程中,才备受“新儒学”论者重视,到明清更成孔子“作”《春秋》的最早证据。但三百年来的“疑古”学者,都怀疑孟轲说古史大半属于想当然。近年在古楚地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内有若干片断与传世《礼记》某些语句相似,于是有的学者竟相发挥想象力,乃至断言昔人疑古全错。问题是楚国祖先早就自称蛮夷,由屈原留下的《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更可知战国间,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因而表明逻辑推论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4〕 说据章炳麟(太炎)在清亡前刊布的《国故论衡》。

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sup>〔1〕</sup>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穀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蚡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穀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

〔1〕 西汉末刘歆继承刘向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增订刘向《别录》为《七略》。除总论性的首篇“辑略”外,“六艺略”以下六篇,全部被抄入《汉书·艺文志》。这是中世纪经学史家都不敢明白否认的史实。参看晚清章宗源、姚振宗所作的《汉书艺文志》的考证,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传》,只过了十多年,到汉武帝初期,便成了“儒术独尊”化为国策之后最为重要的“五经”之首。欲知其详,不妨参看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纬讖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诸著,或者拨冗一阅《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拙文。

这里只说一点,即以董仲舒一派的《春秋》解释,高踞汉廷认可的意识形态化的经义核心地位以后,有关历史的写作,特别是涉及当朝人事或制度的历史陈述,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据所谓公羊学者的说法,一部简单到有时每年除时间记录外仅有一字的古老编年史,字里行间竟隐藏了那么复杂的“微言大义”,怎能不引起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对于新出的历史著作说古述今,是否别有用心,感到狐疑呢?于是汉武帝首先抽查司马迁记述他和其父在位大事记,“大怒,削而投之”;于是汉武帝借李陵案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后任命他为宦官头目以示侮辱;于是司马迁终因坚持忍辱写作

《史记》，而不明不白地从人间消失，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便不难理解。

还在司马迁因著史而受皇帝亲信大臣指责，说他竟敢在太平盛世效仿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宪，那时他就表白，自己绝无希踪“素王”的野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对于已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公羊学者“以经术缘饰吏治”的策略迷倒，或者有意迷倒的汉武帝及其子孙，怎会相信这位史学家的真诚？因而直到百年以后，帝国御前会议仍然判定迁史暴露了刘邦及其布衣将相造反成功的秘密，而拒绝一名藩王抄录《史记》副本的请求。因而同样造反起家的东汉王朝，直到崩溃前夕，短暂当政的王允，仍然声称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而留下“谤书”，必须引为历史鉴戒。这也不难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他们的陈述西汉和新朝兴亡史的著作，分明是《史记》关于西汉前期五朝史的续作，却斥责司马迁诽谤刘邦及其子孙。但由《汉书》的《艺文志》，抄袭刘歆的《七略》，仍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与《楚汉春秋》一起列为儒家经典《春秋》的附庸，便可知时至公元一世纪初，学者仍然经史不分，把述史看作解经，就是说论史等于论政。当然从此以后，写历史必须将有利还是不利政治现状，放在著述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地位。因此，从东汉到满清，不是《史记》，而是《汉书》，便被列朝统治者认作正史的楷模。

不消说，班固仍列迁史为《春秋》的附庸，也起了反作用。首先他本人续作《汉书》，便被指控“私改国史”，从此近现代史的编纂，便直接由宫廷监控。其次导致列朝当局越发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例如东汉末权相王允总结的“历史教训”，直到明清二朝为胜朝

修史,还被君主奉作圭臬。

全部中世纪史表明,第一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遏阻权力导致的体制腐败取向,第二没有任何一名圣君贤相能够真正箝制民意,第三即使在思想文化领域擅长运用软刀子杀头策略的专制者,也没有一人真正实现李斯向秦始皇所献的“安宁之术”,达到“天下无异意”。

于是,在东汉帝国通过“东观修史”,厉行控制“国史”编纂以后,接踵出现的却是三国史记载的兴旺。西晋末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民族大迁徙和南北诸王朝的长期分立,在史学领域引发的效应,便是官方史学互斗,私人史著繁荣。单是记载西晋一统到东晋南迁的史著,到唐初还剩十八家之多。

正因为史学脱离了经学的控制,附庸已蔚为大国,因此两晋王朝清理宫廷藏书,不得不面对现状,将《史记》、《汉书》以来的各类历史著作,从经部分出,归为一部,并迫于数量巨大,将它从丙部晋升为乙部。

北宋的理学先驱程颐,曾想直接干预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唐太宗的“评价”,要求给予“篡名”,并且要求从忠臣不事二主的角度否定魏徵。他的干预没有成功,或许这是朱熹最终将司马光排斥出北宋道学宗师系统之外的一个理由。

然而司马光不肯屈从程颐关于唐太宗、魏徵的“评价”,终究表明自从史部独立以后,没有任何正统学者,可以强迫史学回到完全是经学的奴才地位,不待说这并不表明自命道学而憎恶史学的正统论者愿意放弃努力。

朱熹便是显例。他自拟大纲,指使门徒摘抄司马光书内可资明道的段落,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他晚年索性反对门徒读史,表

明他沉湎于孔孟之道宗教化,已使他认定史学只能充当以道学教义淑世的一种手段,“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鉴戒,至于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必须服从价值取向的左右。因而他以论代史,提倡纲举目张,便隔代相传,特别在清初成为君主通过扭曲历史以辩护现状的一大法门。

清修《明史》是世称廿四史的最后一种,却从清顺治二年(1645)设馆编纂,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凡历四帝九十四年,时间之长,没有别的正史可比。但陈守实先生早有考证,其实康熙中叶这部史稿便由万斯同改成,以后全稿被王鸿绪窃取,又稽迟数十年始得面世。事实是清楚的,背后的曲折更值得深究。关键便在于权力对胜朝史编纂的监控越来越烈。《明史》编修真正的开端,是康熙十八年(1679)诏征“博学鸿儒”。这一特科,修明史乃借口,满洲征服者的真实意向在于牢笼汉族文化精英,将大批学者关进史局,所谓既食周粟,便做不成夷、齐,当然也不再可能再在民间散布思明敌清的言论。不过接着轮到统治者担忧,唯恐暴露满洲在晚明悖德逆伦、从在明朝边疆闹独立而乘明廷之危以攘夺宗主天下的历史真相,于是便出现康熙帝屡次警告监修大臣必须慎重处理明末最后三朝的历史,也导致投机成性的王鸿绪乘康熙中叶宫廷内讧而向君主隐瞒《明史稿》已成的事实,敢于在康熙末才向朝廷报送已被他窃改的部分书稿,敢于到雍正朝颁布《大义觉迷录》后奏呈剩余史稿。

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

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邪教而进行镇压。所谓官逼民反,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珅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政变,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幾《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幾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



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戊戌变法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 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目前